

陈翔鹤选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陈世五

陈翔鹤选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875 插页5 字数261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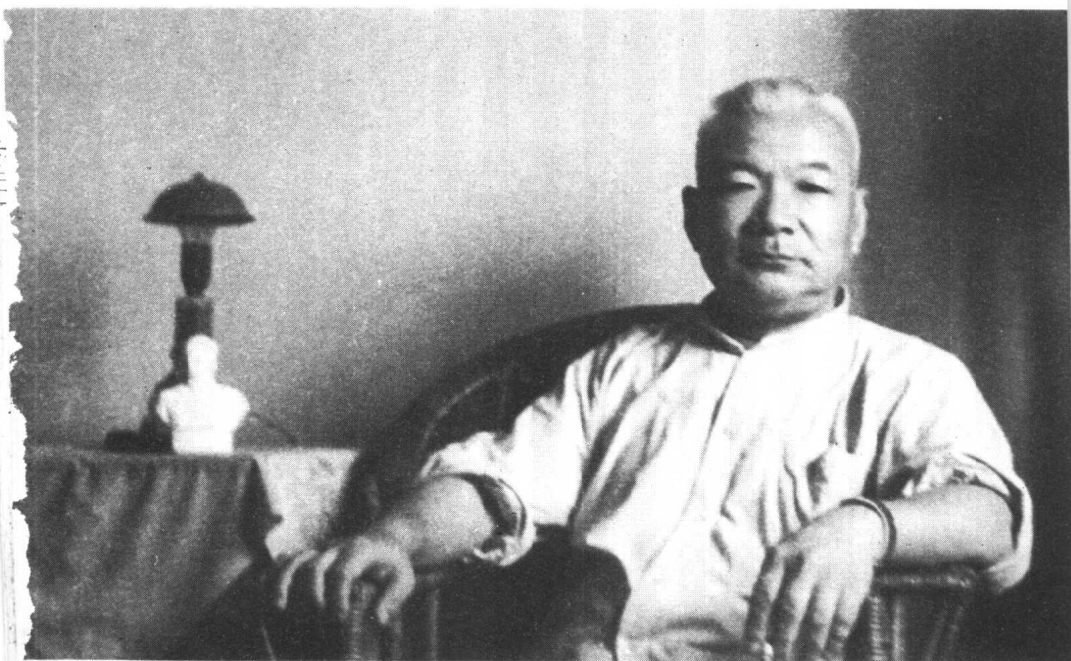
1980年2月第一版

1980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0 册

书号：10118·203

定价：1.31 元



序

冯 至

翔鹤同志于一九六九年逝世，到现在已经十年了。从他的遗著里选出十二篇小说、六篇散文，作为一部选集出版，这在他逝世后的七、八年内是难以想象的。林彪、“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大兴文字狱，大部分优秀的文艺作品被打成“毒草”，许多作者受尽摧残和凌辱，翔鹤因为写过两篇历史小说，更是不曾幸免。那时，凡是历史题材的创作，不管怎么写的，都强加以借古讽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真是“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了。翔鹤就是这样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下死去的。如今，林彪、“四人帮”相继覆灭，拨乱反正，推翻了反革命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使“五四”以来的、尤其是建国以来的优秀作品重见天日，又和读者见面，许多含冤受辱的作家得到平反昭雪。因此，翔鹤的选集

也得以编选出版。

选集里的小说和散文，我有的读过，有的没有读过，如今依次读了一遍，不禁回想起五十年前我们青年时期朝夕相处的岁月和一九五四年翔鹤来到北京后的久别重逢。

“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翔鹤在成都第一中学毕业，后来受到外边新思潮、新文化的召唤，离开灾难深重、军阀混战的四川，到了上海，在复旦大学学习。由于浅草社的关系，从一九二三年暑假起，他跟我和我的同学陈炜谟不断通信。到了这年年底，他为了能同炜谟和我经常在一起，放弃了复旦大学的学籍，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一个学生公寓里住下，过着一边读书、一边写作的生活，有时也到北京大学的红楼去听一听课。不久，他和我的一个长兄般的朋友杨晦也熟悉了。除了寒假暑假外，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无话不谈，不知怎么有那样多说不完的话，讨论不完的问题。杨晦在一个中学里教书，我和炜谟每天要去上课，翔鹤没有这些约束，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他惯于在夜里读书，往往读到鸡叫了、窗纸发白的时候。他通过英文阅读西方的文学作品。那时外国书不象现在这样贵，最容易得到的“万人丛书”、“现代丛书”等每册售价不过一、二元钱，若是到旧书摊去发掘，那就更便宜了，有时也能出乎意外地用极低廉的价钱买到稀奇的珍本。此外，日本的丸善书店不断有书目寄来，只消发出一张订购的明信片，过些日子便会收到通知，用邮局代付的办法把一包订购的书从邮局取

出。俄国的、法国的小说，北欧的戏剧，英国的诗歌，翔鹤都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那些作品有的使人的眼光变得更为锐敏，批判地去观察黑暗的社会；有的用哀怨而悲凉的语句感染读者，滋养着伤感情绪；有的促使人向往光明，但是指不出一条切实的、通往光明的道路。在中国文学里，我们爱好的是魏晋人物的风度和晚唐的、以及清代几个诗人的诗，象杜牧的“浮生恰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等，是翔鹤常常吟咏的诗句。他对于嵇叔夜在受刑之前从容不迫顾日影而弹琴的事迹，尤为欣赏，他不止一次地向我谈过这个故事。由此可见，他在将及四十年后写出历史小说《广陵散》，并非一时的即兴，而是在头脑里蕴蓄很久了。在当代作家中，给他影响较深的，是鲁迅和郁达夫。自传式的叙述，伤感的情调，在翔鹤早期的创作中，处处看得出郁达夫影响的痕迹。鲁迅的小说，尽管举世公认，《阿Q正传》、《祝福》等是最杰出、最深刻的名作，但我们常常谈论的却是《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的魏连殳，以及《伤逝》里的涓生，对他们寄以无限的同情；而读到作者在《肥皂》中对于四铭的肮脏灵魂做的深刻剖析时，我们则拍手称快。这里选的《转变》中的主人公慕海和他那位在上海的新闻记者朋友的背后，不是隐隐约约有魏连殳和吕纬甫的影子吗？《古老的故事》中的苏幼旂夫妇的悲惨遭遇在某些意义上不是使人想到涓生与子君的命运吗？

我写这些往事，无非是要说明翔鹤一部分作品的创作方法和思想内容从阅读上得到过什么启发和影响。至于我们中间的交往和围绕着办刊物进行的一些活动，翔鹤在一九三三年写的《关于“沉钟社”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叙述当时的情景比较详细，现作为“附录”收在选集里，这里就不多说了。

一九二七年暑假，我和炜谟同时在北京大学毕业，翔鹤带着幽默的口吻说，“我也毕业了”。既然都毕业了，就都要为职业而奔波了。我们三人各自到不同的城市的中学里去教书。过去是平日朝夕相处，寒假暑假时暂时分离，此后却相反，平日各自东西，只有寒假暑假时回到北京，多半在杨晦的住处相聚。翔鹤在“毕业”以前，一般是从书本上或是从客观的观察中体味一些人情冷暖，世路坎坷，如今走到社会中，由于他感情真挚而又胸无城府，对外没有戒心而又易于感触，则亲自遭受到不少工作上的挫折、爱情中的痛苦。这里选的一九三四年以前的五篇小说，如果说《悼——》和《不安定的灵魂》主要是想象和虚构，那么，《转变》、《独身者》、《给南多》等篇，就更多是作者亲身的感受了。但都可以说是作者的自传或自白。所谓自传，是在小说里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拆散了又重新组合；所谓自白，是通过虚构人物的言谈行动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总的说来，这些小说抒情的、浪漫的色彩比较浓厚，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伤感。

所谓伤感文学，在欧洲十八世纪中叶曾风行一时，在中

国现代文学史上也一度出现过。作者喜欢用书信、日记等体裁抒发胸中的块垒、倾泄郁结的情怀。他们感到，在主观的幻想与客观的实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为此而发出悲叹。对于伤感文学，无论是外国的或是中国的，今天的读者会感到难以理解，或者甚至读不下去，但在当时它确实反映出—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鲁迅在一封信里说：“多伤感情调，乃知识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终不能改；杨村人却无之，此公实是一无赖子，无真情，亦无真相也”。^①翔鹤早期的小说，尽管使人读后感到悲怆，甚至意气消沉，文字有时也有些夸张，可是写出了自己的“真情”和“真相”，同时也显示出对于旧社会的反抗。在《给南多》里作者这样说：“关于中国的旧有社会，和在旧社会中所寄生着的各种传统人物，以及各种因袭的思想和制度，我却是毫不爱惜，或从根本上就取着鄙弃和反抗的态度的”。时代在前进，那几篇小说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但从历史上来看，使人知道，在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初期，曾经有些知识分子为探索真理和新的生活道路，象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烦恼着、苦闷着，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翔鹤回到成都，他的生活和思想都发生了变化。他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文艺界的统战工作，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常务理事，勤勤

^① 见《鲁迅书信集》上卷，第533页。

恳恳，不辞劳苦，工作了十余年。他的创作也起了变化。《古老的故事》在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与愚昧的同时，还多少保留着旧日的风格和伤感情调，但这可以说是变化的起点。此后，他抑制着满腔愤慨，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活灵活现地刻画出傅校长和《一个绅士的长成》中宋七老爷的丑恶形象。傅校长和宋七老爷之流在黑暗的旧社会蝇营狗苟，贪污腐化，而又春风得意，事事成功；他们这样的人构成国民党反动派的社会基础。他们和《古老的故事》以前的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同居于旧的世界，但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典型，形成鲜明的对照。

新中国成立后，翔鹤在五十年代写的《喜筵》和《方教授的新居》，无论内容和形式都与过去不相同了。前者描绘了老工人顾师傅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工作踏踏实实，接受新思想，就能身体力行；后者的主人公是个旧知识分子，学有专长，也有从旧社会带来的缺点，在落实党的政策的感召下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

一九五四年，翔鹤来到北京，我们自从一九三〇年分手后又重新会晤。由于我们的住处彼此距离很远，更加以工作繁忙，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每次见面，仍然跟青年时期一样，无话不谈。在有限的几次谈话中，有两次与选集里的文章有关，我还记得清楚。一次是在我家里，他向我述说，一九四七年后，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进步力量更为猖獗，成都白色恐怖日甚一日，他也被列入黑名单。党组织听到这个消

恩，派人通知他必须立即离开成都。他说，若是那天晚上没有走，很可能就被特务抓走了。由于李劫人的帮助，改换姓名，在乐山的嘉乐纸厂充当住厂秘书，一直到四川省的解放。我们谈话后不久，李劫人逝世了，翔鹤写了两篇文章纪念死者，表达感激和怀念的心情。尤其是《李劫人同志二三事》一文，情深意切，娓娓动人，在收尾处引用了一首唐人哀悼旧友的五言律诗，诗的最后两句“日斜休哭后，松韵不堪闻”，虽是古人的诗句，却表达了翔鹤深厚的哀思。

又一次是一九六二年在某某饭店里开会，休息时间我和翔鹤谈到他在《人民文学》先后发表的《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翔鹤到北京后，编辑《文学遗产》，他组织讨论，联系作者，审阅文稿，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古典文学研究做出贡献。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六〇年，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曾开展过一次关于陶渊明的讨论，大部分文章都在《文学遗产》发表。翔鹤作为刊物的主编，自然也要对陶渊明做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这样的讨论对于推动古典文学研究的开展是有益的，但大都是围绕着陶渊明的诗歌是否现实主义、有多少现实性和人民性等问题进行争论，而对于诗人的思想和内心活动注意不够。陶渊明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有生必有死，是自然的道理，“佛家说解脱，道家说羽化，其实这些都是自己仍旧有解脱不了的东西”。陶渊明就是从这种思想出发，为自己写出《挽歌诗》三首。至于《广陵散》，我在前边提到过，翔鹤在青年时期

就很欣赏嵇叔夜夜顾日影而弹琴的事迹，这次他说，小说中很大部分是根据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的关系》。鲁迅在这篇文章里还引用过《庄子》里的一句话：“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①鲁迅引用了这句话后，紧接着说：“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翔鹤的用意，是要从“知人心”方面来描绘历史人物。我向他说，我愿意跟他合作，给古代著名的诗人每个人都绘制一幅剪影，通过具体的事迹体现他们的内心活动和思想特点。这样做，对古人也许会有所歪曲或误解，不符合实际，但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探索诗人的精神世界，也许会有助于对古典文学的理解吧。

这两篇历史小说，是翔鹤用力最勤、工夫最深的创作，发表后也得到一些好评，不料到了一九六六年，竟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一顶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帽子向作者飞来，使作者蒙不白之冤，不能申辩，也不容许申辩。林彪、“四人帮”本来是些叛徒、特务，却污蔑别人是叛徒、特务；他们自己存心要搞政变，却硬说别人谋划政变；他们挖空心思搞阴谋文学和影射史学，却栽赃别人的作品是指桑骂槐或借古讽今。他们用阴险毒辣的手法陷害了广大的干部、科学

^① 这句话见于《庄子·田子方》，是楚人温伯雪子批评鲁国孔丘门徒时说的。鲁迅文章中说是季札说的，是鲁迅记错了。

家和作家，其牵连之广，毒害之深，在痛定思痛的今天，回想起来，仍然感到不寒而栗。翔鹤在十年前逝世，不及见林彪、“四人帮”的相继覆灭，不能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心情舒畅地工作了，我们深感遗憾。现在，翔鹤的生前好友还常常谈到他，怀念他，并提议出版他的选集，于是从去年十月，在大家共同主持下，由跟翔鹤一起工作过许多年的白鸿同志经手编选出这部选集，也可以弥补这个遗憾于万一了。

1979年3月20日于北京

目 次

小 说

悼——	3
不安定的灵魂	15
转变	89
独身者	115
给南多	165
古老的故事	197
傅校长	239
一个绅士的长成	260
喜筵	279
方教授的新居	295
陶渊明写《挽歌》	318
广陵散	335

书 评

读《艾芜短篇小说选》	369
《离婚》初探	378
《山高水远》	387

散 文

怀念与追悼	401
李劫人同志二三事	407
关于“沉钟社”的过去现在及将来	418

小 说

悼——

我现在已知道怎样的追悼我的妻了，在我的臂上已缠上了一条黑纱。这一种忧郁而且质素的小小微号，从前固是久已蒙在了我的心上，然而到现在才明白地表露出来。“不算太迟吗？我的妻啊！”在那一天，新缠上黑纱的那一天，我一人跪在她的，不，也是我们的床前，将头埋在枕上——在上面还馀留得有半年来所不忍洗去的她的芳泽——癫狂而且绝望，伤悲地流着泪说。但是这里并不着一点回应，只是一声声低微暧昧的咽呜声突然地奔入了我的耳鼓，是她的？还是我的呢？我很惑疑，更为恐怖，因此我便悚然地起立，并向外奔出了。总算是在白白的衣衫上加上了一层美饰，能使得在道旁遇见的行人都是那样的注目。脸和衣衫都是白白的，而且臂上还有那赫然的一条，大约人们都是可以觉得了——我此刻是何等的悲伤！

虽说这已是暮春天气，各处的树梢都已抽出绿绿的嫩叶，细草也从沙土中抬起头来，而我却同从前一样，如丧家